

庞泓雪 – 解植永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匈牙利德布勒森市华裔儿童中文传承研究

摘要

本文以匈牙利德布勒森市新兴工业移民社区的华裔儿童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儿童 $n=9$ ，家长 $n=11$ ）与3个典型家庭的深度访谈，系统考察该群体中文传承的实践状态与认同建构。研究发现：华裔家庭普遍形成功能性语言分区，中文使用域高度收窄，且儿童读写能力发展因缺乏体系化支持而明显滞后；家长期望整体偏高并带有较强的“母语者执念”，但理想语言身份与现实能力之间的落差构成了儿童内在的心理张力；值得注意的是，语言能力的退缩并未导致文化认同的同步松动，多数受访儿童通过节庆仪式等非语言路径独立维系了文化归属感。基于此，本文提出，中东欧华裔儿童传承语教学应从“母语者标准”向“情感与功能导向”转型，在教学中运用“跨语言实践”（Translanguaging）激活儿童内在动机；同时，呼吁依托当地孔子学院（如“OTT-HOME”社区课程）及在地中资企业资源，构建“家校社”协同的传承支持网络，以填补当地中文教育生态的体制性缺口。

关键词： 华裔儿童，传承语，文化认同，家庭语言政策，跨语言实践，匈牙利

PANG HONGXUE – XIE ZHIYONG

A Study on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Transmission Among Ethnic Chinese Children in Debrecen, Hungary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transmission practice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ethnic Chinese children in Debrecen, Hungary, an emerging industrial immigrant community. Drawing 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children $n=9$, parents $n=11$)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ree typical families, the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ir language reality. Findings reveal that Chinese families predominantly adopt functionally mixed language strategies, leading to a narrowed domain of Chinese language use and significantly lagging literacy skills due to the lack of systematic support. While parental expectations remain high and exhibit a strong ‘native-speaker obsession,’ the gap between idealized linguistic identity and actual proficiency creates internal psychological tension for the children. Crucially, however, the erosion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does not translate into an equivalent loss of cultural identity; most children independently maintain a sense of cultural belonging through non-linguistic pathways such as family rituals and festival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for Chinese childre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hould shift from a ‘native-speaker standard’ to an ‘emotional an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utilizing ‘Translanguaging’ pedagogies to activate intrinsic motivation. Furthermore, it call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llaborative ‘family-school-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leveraging local Confucius Institute initiatives (e.g., the ‘OTT-HOME’ community program) and locally-based Chinese enterprises—to fill the institutional gaps in the reg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cosystem.

Keywords: ethnic Chinese children, heritage language, cultural identity, family language policy, Translanguaging, Hungary

一、引言

海外华裔儿童的中文传承是一个涉及语言能力、家庭政策与身份认同的复合议题。既有研究已确立若干基本命题：传承语学习者有其不同于外语学习者的独立习得逻辑（Valdés, 2005）；家长的语言态度与日常实践对子女的中文保持程度具有决定性影响（Wang, 2020）；在多语环境中成长的华裔儿童，往往呈现出听说能力相对稳定、读写能力明显滞后的“不对称双语”状态（Cummins, 2005）。近年来，欧洲华裔社区的传承语研究已出现若干突破。Hu与Yagmur（2026）对荷兰华裔社区的个案研究表明，华裔儿童的语言保持受到家长、教育者与学生三方互动的共同塑造，族群归属感在传承语维系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然而，中东欧语境下的案例研究仍几近空白，德布勒森这类新兴工业移民社区尤为如此。

与此同时，现有研究多将语言能力作为衡量传承语习得成效的核心甚至唯一指标，对文化认同与语言能力之间关系的讨论相对薄弱。Li Wei（2014）从跨语言实践的角度指出，双语者的身份建构并不简单等同于其语言能力的分布状态，语言使用的萎缩与文化归属感的维系可以并行共存。在语言能力与认同关系的研究上，Lee, Her与De Costa（2024）通过对英国华裔学习者的生命史叙事分析，揭示了传承语认同发展的动态性与非线性轨迹，指出认同建构并不随语言能力的高低而线性起伏，而是在不同生命阶段、不同交际对象与场所中持续协商。Shen与Jiang（2023）对澳大利亚三个华裔移民家庭的叙事研究同样发现，儿童在传承语习得中并非被动的政策执行者，其个人意愿与情感体验对实际语言保持程度具有独立的影响。在教学干预层面，Cun（2025）对美国华裔幼儿社区课堂的观察研究表明，跨语言实践（Translanguaging）能够有效激活儿童的多语资源，促进其语言身份的正向建构，为传承语课堂设计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证依据。上述研究多集中于英语圈，这一论断在中东欧华裔社区是否同样成立，目前尚无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匈牙利德布勒森市提供了一个颇具典型性的观察窗口。作为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近年来因宁德时代、宝马等中资及跨国工业项目的大规模落地，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中国移民家庭定居。2019年成立的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是本地中文教育的主要制度性支撑，但其课程以非华裔学习者为主要服务对象，针对华裔儿童传承语习得的专项支持几乎空白。在这一背景下，华裔家庭在中文传承上几乎处于缺乏系统性支持的状态，其语言实践与认同建构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值得深入考察。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混合方法,重点考察以下三个问题:德布勒森华裔儿童的中文使用域呈现怎样的分布特征?家长的期望结构与语言政策如何影响儿童的学习实践?语言能力与文化身份认同之间是否存在非对应关系,其背后的维系机制是什么?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为全面、深入地探究中东欧新兴华裔社区儿童传承语习得的真实图景,本研究在方法论上采取了结构化问卷与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范式。以下为本研究的田野观测背景与受访者画像。

2.1 研究对象与田野背景

本研究的田野点选定为匈牙利德布勒森市。受近年来中资企业集中出海投资的影响,该市华人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早期的商贸群体逐渐过渡到以企业外派高管、技术人员及陪读家属为主的新型移民社区。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了居住在德布勒森市的华裔儿童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共回收有效华裔儿童问卷9份,华裔家长问卷11份。9位华裔儿童平均年龄14岁左右,其中有5位是自出生起就生活在匈牙利,有4位是近5年内从中国来到匈牙利生活。为了更深入地探究语言实践背后的微观机制,本研究选取了三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华裔家庭进行深度访谈。这三个家庭在移民形态、家庭语言政策及未来规划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个案A(在地扎根型):父母均为中国籍,在德布勒森从事个体商贸经营。两名子女均在匈牙利本地出生,受访的小儿子(6.5岁)目前正在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的“OTT-HOME”社区项目接受系统的识字与阅读训练。

个案B(潜在回流型):父母均为中国籍,在当地经营中餐饮业。受访的小儿子(6岁)于5岁时才移居德布勒森,具有一定的国内语言环境基础。

个案C(跨国婚姻型):母亲为中国籍,父亲为匈牙利籍。受访女童(儿童A)自出生起生活在匈牙利。家庭内部呈现复杂的跨语言交际网络(父母间使用英语,父女间使用匈牙利语,母女间使用中文)。

访谈前均已征得受访者(及未成年人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实现数据的三角互证。家长问卷重点考察家庭语言政策的隐性与显性特征、期望结构与教育资源投入；儿童问卷涵盖日常语言使用场景的频率分布、中文学习困难自评与自我文化身份认知。量化数据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进行分布呈现。访谈提纲围绕“家庭日常语言互动”、“中文学习的阻力与动力”以及“文化节庆体验”三个维度展开。单次访谈时长约45-60分钟。访谈录音转写后，运用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对文本进行编码，提炼出关键的主题范畴。受限于样本规模（儿童 $n=9$ ，家长 $n=11$ ），本研究定位为探索性质性个案研究，量化数据不作统计推断，核心论点的支撑主要依赖对定性材料的“厚描述”。

三、德布勒森华裔儿童中文传承状况调查

基于前期收集的问卷数据与访谈文本，本节将从家庭环境、家长期望、语域分布及文化认同四个维度，多角度剖析该群体中文传承的微观现实。

3.1 家庭语言政策与实践形态

访谈显示，德布勒森华裔家庭的语言环境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沿着一个从严格单语到高度混用的连续统分布。坚持“在家只说中文”的家庭属少数，更普遍的形态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形成的功能性分区：情感表达、家庭伦理、与祖辈沟通等场景倾向使用中文，学业讨论、本地社交及娱乐消费则自然切换至匈牙利语。

这种分区并非单纯的语言妥协，而是折射出中文在家庭生活中所承担的特定功能定位——它是代际情感的传递媒介，而非全功能的日常交际工具。一位受访家长如此描述：“我跟她说中文，她回答匈牙利语，但我们都听得懂，时间长了就这样了。”这种被动形成的混合模式，在许多华裔家庭中已成为常态，并非家长的主动政策选择。

尽管执行方式各异，家长的语言态度却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中文被普遍视为族裔身份的核心标志与代际情感的连接载体，其维护动力更多来自文化使命感与身份焦虑，而非对语言市场价值的理性计算。“不

学中文，他就不是中国人了”——这类表述在访谈中反复出现，折射出家长对语言与身份之间关系的深层预设，尽管这一预设的儿童身上并未完全得到印证。

3.2 家长期望的结构特征

11份家长问卷在“对子女中文水平的最终期望”这一问题上呈现出鲜明的分布特征（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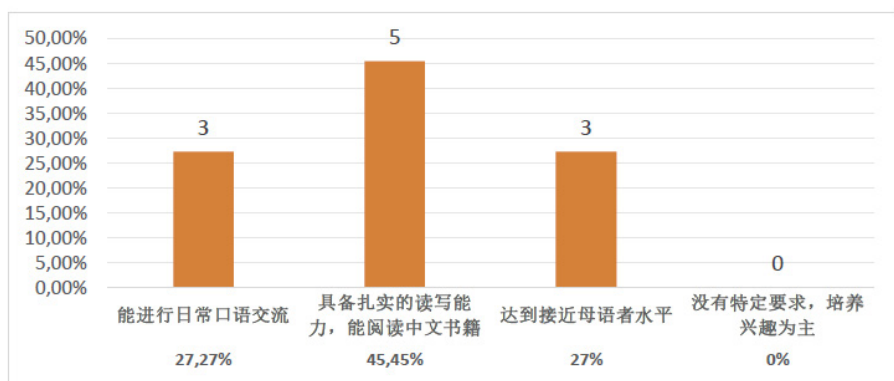


图1：华裔家长对子女中文水平的期望分布

最值得关注的数据是最后一项：无一位家长选择“以培养兴趣为主，没有特定要求”。这与公立学校非华裔少儿家长的普遍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多以兴趣培养为主要目标，对能力发展并无明确预期。华裔家长的目标设定是系统性的、能力取向的，且没有妥协余地。

这一高期望的形成有其内在逻辑。访谈揭示，家长的期望蓝图通常包含多个层次：基础层面是确保子女能与祖辈及中国亲属维持实质性沟通；中层是通过语言习得完成文化身份的代际传递；更深处则是对子女未来在双语劳动力市场中竞争优势的前瞻性布局。然而，这种接近“理想双语者”的培育愿景与儿童实际所处的语言环境之间存在相当距离，在体制内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家庭亟需外部资源的介入，由于德布勒森本地缺乏专业的华裔儿童传承语教学机构，曾给华裔家庭带来巨大的时间与经济消耗。受访家长A指出，在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OTT-HOME”社区中文课开设之前，为了让子女接受正规的识字和阅读训练，他们不得不每周驱车前往首都布达佩斯上课，“时间成本很大，价格也很昂贵”。这一客观存在的资源瓶颈，导致许多家庭在中文传承上

长期处于“孤立作战”的困境。然而，“OTT-HOME”项目的在地化开展，显著改善了这一生态。在此说明，“OTT-HOME”项目是由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主持开展的面向社会成员的中文听说读写课程项目。家长A明确表示，该课程不仅有效提升了儿童的读写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集体的文化浸润，增强了儿童的文化归属感。

尽管问卷数据显示华裔家长普遍抱有高期望，但深度访谈揭示了这种期望背后的具体分化。对于潜在回流型的个案B而言，家长的首要焦虑是“语言磨蚀（Language Attrition）”。家长B坦言，虽然目前对孩子的整体水平要求不高，但核心底线是“怕他忘记该怎么写汉字”，因为家庭未来大概率会回流中国生活。这也印证了读写能力（尤其是汉字书写）是海外传承语保持中最脆弱、最易流失的一环。

3.3 中文使用的实际分布：语域收窄至家庭内部

9份华裔儿童数据呈现了一幅与家长期望形成明显落差的现实图景（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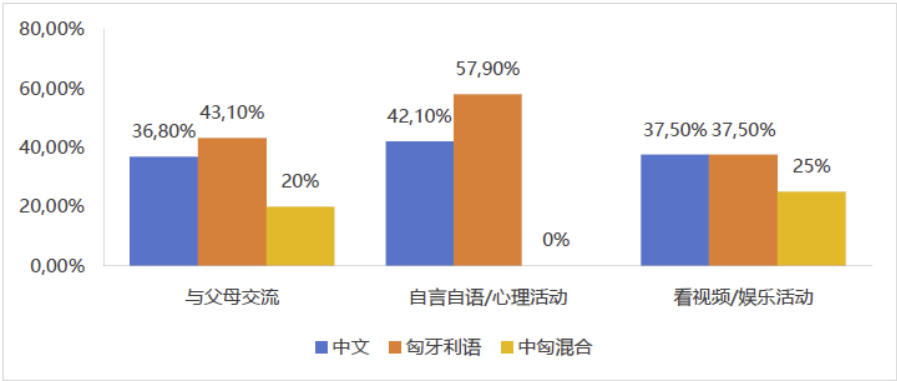


图2：华裔儿童在不同情境下的语言使用分布

数据显示，中文的实际使用场景高度集中于与父母的家庭内部对话；在自言自语、娱乐消费与同伴交流等情境中，匈牙利语均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典型的“内在言语匈牙利化”¹现象——当儿童独处

¹ 一个人的内在思考过程（内在言语），其运作的“语言系统”或“表达习惯”受到了匈牙利语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匈牙利语成为了其思维的主要载体或“默认语言”。

时,其内部言语体系已完成向强势社会语言的切换,中文的输出主要由外部(家庭)要求触发,而非源于内在的自发需求。

语域收窄的成因是结构性的,而非个体态度问题。匈牙利语在学校、媒体与同伴网络中形成全方位的浸润优势,覆盖了儿童获取知识、建立社会关系、构建自我认同的绝大部分场景。中文在这一结构中能够维持的空间,只剩下家庭这一最后的“保留地”,且即便在家庭内部,受上文所描述的功能性混用模式影响,中文的实际使用也在持续萎缩。

读写能力的滞后是语域收窄最直接的后果之一,也是家长高期望与现实之间落差的核心体现。在缺乏系统性书面语输入环境的情况下,汉字认读与中文书面表达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家庭的主动干预,而这种干预在强度、系统性与专业性上均难以与正规教学机构相比。部分儿童的口语能够维持日常家庭对话的基本需求,却无法独立阅读一篇简单的中文文章,更遑论写作²。

在跨国婚姻家庭中,家庭语言政策(FLP)的执行面临更复杂的空间挤压。以个案C为例,受前文所述复杂家庭多语网络的影响,儿童呈现出典型的“不对称双语”状态:儿童能够进行日常中文对话,但不具备拼音基础,“不会认读,会写的汉字极少”。即便如此,中国籍母亲依然展现出强烈的中文维持意愿,将双语能力视为一种“竞争优势”,并期望借此维系对中国文化的感知。这表明,即便在混血家庭中,中文的工具性价值(语言优势)与整合性价值(文化认同)依然是家长坚持中文传承的双重驱动力。

3.4 文化认同的维系:语言之外的路径

上述语言能力图景与儿童的身份认同表达之间,存在一个引人关注的落差(见图3)。

即便在日常中文使用十分有限、读写能力明显滞后的情况下,本研究中9名受访德布勒森华裔儿童中,有5名认为自己“更像中国儿童”,另有4名儿童将自己定位为双重或混合文化身份。没有儿童将自己单一归类为“匈牙利人”。

² 以上判断来源于家长自我报告及访谈中儿童的自我评估,非标准化语言测试,结论应在此范围内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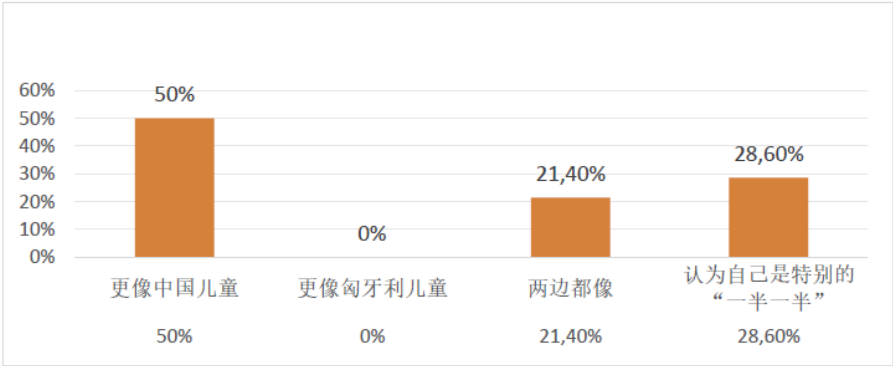


图3：华裔儿童自我文化身份认同分布

这一数据的意义在于：它表明文化认同的维系并不以语言能力为前提条件。进一步的访谈与开放题回答揭示了文化认同的实际维系载体——不是中文表达能力，而是一套由日常生活实践构成的情感经验：春节的红包与饺子、中秋的家庭聚会、饮食习惯中挥之不去的中国味道、祖辈定期的视频通话、家中悬挂的中国画与春联。这些仪式性的文化实践，在语言能力之外为儿童提供了持续的“中国性”体验，使其在认同层面保持与中国文化的连接。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儿童在开放题中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张力：他们渴望能像“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一样自如地使用中文，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这一理想形象之间存在距离。“我觉得我是中国人，但我的中文不够好”——这类表述折射出理想语言身份与现实能力之间的内在裂缝。这种裂缝既可能成为学习动力的来源，也可能在落差持续扩大时转化为自我效能感的损耗，进而加速学习动机的衰退。

四、华裔儿童中文传承的实践启示与对策建议

综合前文的实证调查结果，德布勒森华裔社区的语言实践为我们揭示了传承语习得中独特的运行逻辑与现实困境。本节将在此基础上提炼核心的理论与实践启示，并针对性地提出多维联动的干预对策。

4.1 实践启示：语言能力与文化认同的非线性演进与内在张力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可以概括为一个重要命题——在德布勒森华裔儿童群体中，语言能力的发展与文化认同的维系并非简单的线性正相关关系；文化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非语言路径得以独立维系，但这种维系并非没有隐患。

首先，这一发现与Valdés（2005）的论断形成了跨地域的实证呼应。传承语学习者的习得路径与认同逻辑有其自身的结构性特征。德布勒森的数据进一步证实，即便在语言能力发展受到强势社会语言（匈牙利语或英语）严重压制的情况下，本研究中多数受访华裔儿童依然可以通过家庭仪式、节庆参与等非语言渠道持续维系“中国性”体验。前文所述的日常跨国文化实践，实际上为儿童构建了一个物理空间之外的“文化飞地”，使得语言的功能性收缩并未自动导致文化认同的相应松动。

其次，这一结论对Wang（2020）关于家庭语言政策（FLP）的讨论既构成印证也形成了补充。德布勒森的数据证实了家长的高期望与高投入（如不辞辛劳跨城求学）对儿童保持中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更深层的启示在于，家长的日常语言管理与文化实践所塑造的不只是子女的语言能力，更是一个坚韧的“认同框架”。换言之，即便儿童“说”或“写”的能力存在短板，“是中国人”的内在感受依然能通过多重渠道得到确认。

然而，这种非线性关系并不意味着语言能力的停滞是毫无风险的。深度访谈揭示，理想语言身份与现实能力之间的落差，构成了儿童内在世界一种持续性的心理张力。这种张力在儿童尚小或处于跨国婚姻家庭（如个案C）时，可能表现为一种试图掌握双语优势的学习期待；但随着年龄增长、落差感加剧，尤其是在缺乏外部成就感正向激励的情况下，极易转化为对中文学习的自我效能感损耗乃至全面回避。如果不加干预，当语言能力长期停滞而家长的认同期待持续存在时，这种双向挤压的张力终将对儿童的母文化认同本身产生反噬与剥离。

4.2 对策建议：构建“家校社”协同的在地化传承支持网络

基于上述启示，德布勒森乃至中东欧新兴华裔社区的传承语教学亟须突破“家庭孤军奋战、家长充当草台班子”的单一模式。作为当地中文教育的核心制度性支撑，孔子学院应发挥枢纽作用，构建结构化的支持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重塑家庭语言政策导向，从“母语者执念”向“功能与情感维系”转型。

在德布勒森缺乏全方位中文语境的现实下，家长单方面将传承语目标设定为“接近国内同龄人母语水平”是不切实际的，只会持续制造教育焦虑与代际冲突。鉴于潜在回流型家庭（如个案B）对汉字磨蚀的隐忧，教学机构的首要干预对象应当包含家长群体。建议教育机构或孔院定期开设“华裔家长语言规划工作坊”，协助家长建立科学的双语发展观。引导家长接受儿童的“不对称双语”现状，将务实目标降维至：首先维持中文作为家庭情感纽带的绝对地位，其次集中攻克读写能力的断层。通过循序渐进的家庭任务设计（如亲子共读中文绘本），使中文的使用场景逐步超越单调的“餐桌指令”边界。

第二，显性化身份认同建构，运用跨语言实践（Translanguaging）激活内在动机。

鉴于文化认同的维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抗性，这一优势应被教学设计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传统的对外汉语（L2）教学往往追求“全中文浸入”，但这在传承语课堂上容易让本就存在语言自卑感的华裔儿童感到挫败。针对个案C这类中外混血儿童或习惯用匈牙利语思维的华裔二代，课堂应积极引入跨语言实践理念（Translanguaging），即并非简单允许母语“夹杂”，而是将不同语言资源视为一个统一的语言库（unified linguistic repertoire），通过语言间的动态调用实现更深层的认知加工与身份认同建构（Li Wei, 2014）。允许甚至鼓励他们在表达受阻时借用匈牙利语或英语作为支架（Scaffolding）。同时，将双语背景转化为课堂核心资源，例如开展“我的中匈双城记”主题演讲、中国节庆手工坊等活动。通过提供丰富的文化展示机会，将儿童对自身语言水平的“焦虑感”转化为拥有独特双重文化身份的“自豪感”，自内而外地激活其探索传承语的源动力。

第三，做深做实社区服务，依托孔子学院填补体制性与资源性缺口。

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近期开展的“OTT-HOME”社区中文课提供了极佳的破局范本。该项目有效缓解了前文所述扎根型家庭（如个案A）跨城求学的资源瓶颈，及时填补了在地化传承语教学的体制性缺口。未来，孔院可从以下两个维度进一步深化在地化服务：一是实行精细化分层教学，针对不同移民形态实施定制化课程。例如，针对家长A与B的子女（有一定听说基础），开设以识字、阅读和中华文化体验为主的“传承语拔高班”；针对个案C（零起点混血儿童），则开设侧重基础交际与兴趣培养的“双语启蒙班”。二是首创“企院联动”机制，

结合德布勒森近年来宁德时代、宝马等大型跨国及中资企业入驻的宏观背景，孔子学院可联合这些在地企业，开展“华裔青少年中企参访日”或“未来双语人才夏令营”。这一举措能够将中文的价值从单一的“爷爷奶奶的语言”（整合性动机）拓展为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未来职业语言”（工具性动机），用现实的经济与职业前景重塑高年级华裔儿童的中文学习意愿。

五、结语

本研究以德布勒森新兴工业移民社区为窗口，揭示了华裔儿童“中文功能性退缩”与读写滞后的“不对称双语”格局。研究核心发现提示，语言能力的弱化并未自动导致文化认同的剥离，多数儿童通过非语言路径维系了坚韧的“中国性”归属感。这一发现深化了对家庭语言政策隐性认同形塑功能的认知（Wang, 2020），但也警示了理想身份与现实能力落差所带来的潜在心理张力。

在实践层面，本文强烈呼吁，面对中东欧华裔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传承语教育必须走出“孤军奋战”与“唯母语者标准”的困局。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OTT-HOME”项目的在地化实践表明，体制性力量的介入至关重要。未来，依托孔子学院构建“家校社”协同网络，在教学中引入跨语言实践（Translanguaging）理念，并积极联动在地中资企业（如宁德时代、宝马等），将是破局中东欧传承语教育生态困境的必由之路。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较大局限，尚属探索性质的个案考察。样本规模（儿童 $n=9$ ，家长 $n=11$ ）的局限性使得结论暂不具备广泛的统计推断效力；单一城市的横截面数据亦无法完整呈现语言与认同随年龄增长的动态演变轨迹。未来研究可从三个方向推进：其一，在中东欧多国（如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华裔社区扩展样本，开展跨国家比较研究，以检验德布勒森模式的区域普适性；其二，引入纵向追踪设计，考察同一批儿童在青春期前后语言能力与文化认同之间关系的动态演变；其三，将跨语言实践（Translanguaging）教学干预作为准实验变量，检验其对传承语儿童语言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动机的实际影响效果。

参考文献

- 康晓娟 2015. 海外华裔儿童华语学习、使用及其家庭语言规划调查研究——以马来西亚3~6岁华裔儿童家庭为例[J]. 语言文字应用, 2015(2): 26–34. [A Survey on Overseas Chinese Children's Chinese Learning, Use and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ged 3–6 in Malaysia]
- 黎敏 202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匈牙利的汉语教学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J].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2020(02): 100–110.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Hungary, a Countr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马燕华 2003. 初级华裔留学生汉语家庭语境调查与分析[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03(1): 47–53.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Family Context for Beginner Heritage Chinese Students]
- 牟芳芳, 郑咏滢 2022. 跨国家庭的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双语发展——以在沪中英/中法跨国家庭为例[J]. 外语界, 2022(3): 56–64.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Children's Bilingual Development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English and Chinese–French Families in Shanghai]
- 钟曼妮 2025. 匈牙利线上中文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J]. 欧洲中文教育, 2025(2): 53–70.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Hungary] <https://doi.org/10.61637/cltcee.2025.2.3>
- Cummins, Jim. 2005. 'A proposal for action: Strategies for recognizing heritage language competence as a learning resource within the mainstream classroom,'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5, 89(4): 585–592.
- Cun, Aijuan 2025.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in a community-based Chinese heritage early childhood classro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025, 29(3): 667–683. <https://doi.org/10.1177/13670069241243204>
- Hu, Hong – Yagmur, Kutlay 2026. "'Jij bent Chinese! Ik niet! (You are Chinese! I am not!):'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maintenance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26, 47(2): 1236–1250.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24.2418463>
- Lee, Her – De Costa 2024. 'Heritage language identity matters: tracing the trajectory of a Chinese heritage mother and contested Chinese dual language bilingual educa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24, 14(1): 75–96. <https://doi.org/10.14746/ssllt.42372>
- Li, Wei 2014. 'Translanguaging knowledge and identity in complementary classrooms for multilingual minority ethnic children,' *Translanguaging in Education*, 2014, 1(1): 11–26.
- Shen, Chunxuan – Jiang, Wenying 2023. 'Parents' planning, children's agency and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re-storying the language experiences of three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Australi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3, 13:1083813.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1083813>
- Valdés, Guadalupe 2005. 'Bilingualism,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and SLA research: Opportunities lost or seized?,'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5, 89(3): 410–426. <https://doi.org/10.1111/j.1540-4781.2005.00314.x>
- Wang, Yining 2020. Heritage language maintenance attitudes of Chinese migrant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Ph.D. dissertation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